

略论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

李碧波¹

(1.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有清一代, 广大晋商经商于新疆, 成为新疆历史上重要的商人群体。他们的活动成为新疆与中原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 是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 维护边疆安稳, 促进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清代; 新疆; 晋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14

明清时期, 晋帮商人活跃于中国商界。在明代, 晋商就与新疆地区的民族进行着茶马交易。到了清代, 晋商在新疆的贸易活动则进一步扩大。清代晋商作为新疆历史上重要的商人群体, 他们在推动新疆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就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进行重点论述。

一、清代晋商在新疆的主要活动

晋商作为清代较早进入新疆贸易的商人之一, 他们在新疆地区的贸易十分活跃。在新疆有战事的情况下, 晋商与官方合作, 负责运送粮草, 同时进行随军贸易。当新疆安定下来后, 晋商迅速投入到新疆的经济建设中来, 积极进行民间商贸活动。

(一) 晋商在新疆的随军贸易

在古代军事活动中, 粮草供应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而清代晋商最早在新疆的活动就是为清军运送粮草, 同时也为士兵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便军需^[1]。

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在康熙朝便有记载, 彼时哈密清军的粮草供应就是“用山西、陕西小车三千辆, 每辆用车夫三名, 自嘉峪关至哈密”^[2]所述。到了雍正年间, 包括晋商在内的广大商民更是积极踊跃去哈密进行贸易。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时, 晋商范氏更是承担起清军粮草的运输任务, 并先后为清军捐输巨额财物。清政府为嘉奖范氏功绩, 特赐范毓麟“太仆寺卿, 章服同二品”^[3], 其弟范毓麟也得到重用, 先后担任千总、守备之职。同治三年(1864年), 绥远将军和山西巡抚受朝廷委派“宣谕口内商民前往伊犁等西北地区贸易, 以裨益军需”^[4], 晋商再次承担起为清军提供军需物资的重任。左宗棠收复新疆时, 许多商人便随军西征“赶大营”, 成群结队出西口, 而古城(奇台)“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 燕晋商人多出焉”^[5]。

(二) 晋商在新疆的民间贸易

除随军贸易外, 晋商也加大了在新疆地区的民间商贸往来。他们在新疆发展长途贩运贸易, 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对商品的需求。之后, 随着贸易的深入, 晋商又在新疆开展起了金融票号业务。

1. 发展长途贩运贸易

由于不同地区人民对物质有不同的需求, 晋商遂将丰富的中原商品运往新疆销售, 又将新疆的商品运回中原销售。据《新疆志稿》记载, 每年有价值二三百萬的商品从中原诸省运至新疆, 包括新疆所需的绸缎、茶叶、纸张及各类器物等。“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 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 其中由燕晋商从归绥所运至疆的货物就占十之六七^[6]。晋商用这些中原商品来换取新疆的皮毛、呢绒等农牧产品, 再运回中原进行贩卖, 极大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需求。同时, 一部分晋商也抓住贸易机遇, 在新疆建设驼场, 大力发展驼运业。

在晋商所贩货物中, 茶叶是大宗货物。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 驻扎新疆的广大官兵, 还有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民, 每年都需要大量茶叶。道光年间, 仅南疆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

喀喇沙尔、和闐八城)每年需茶至少二十余万封^[7],全疆对茶叶的需求量则更大。在众多商人中,晋商是将茶叶销往天山南北的主要力量。甘肃、新疆的茶叶一般由晋商承办,他们几乎垄断了整个天山南北的茶业,正所谓“昔承平之时,官茶引课,咸属诸晋商,谓之晋茶”^[6]。

除茶叶外,晋商还将大量绸缎布匹运至新疆售卖。因手工业落后,新疆各族人民普遍喜爱中原商人所贩的绸布,当地人称为“斜布”。当时晋商中的佼佼者“大盛魁”旗下的“天顺泰绸布庄”就经营各种绸缎布匹,分号遍及各地,远达新疆。它按新疆各少数民族对布匹的需要,购置了大量的斜纹布运往当地贸易,获利颇丰。除大的商行外,也有部分晋商小贩不远千里前往迪化贩布,山西县志里就记载曲沃的张本贯“贩布有积蓄,娶於迪,生子女”一事^[8]。另外,清政府也曾大量采购绸缎运至新疆,这其中还有不少是晋商所贩产自山西的绸缎。官方采购山西绸缎之事有惠于山西、新疆两地人民,“山陕所产绸缎纱绫,亦得于新疆一体销售,于该省等商民不无有益”^[9]。

2. 开办金融票号业务

嘉道时期,钱庄票号业务的开展作为晋商活动的坚实后盾,极大便利了晋商的商业往来,进一步开拓了晋商的经营版图,“新疆、满蒙诸地之贸易,鲜不为彼等所垄断”^[10]。随着晋商在新疆商业贸易的成功,金融票号业务在新疆也蓬勃发展起来。

早在票号设立之前,在新疆的晋商就经常帮各地驻军汇兑军饷。当时,各省的协饷必须先上缴至归化城交予转运局,再转发新疆各城。繁琐的交付过程造成军饷运解不及时,极大拖延了军饷的发放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各城驻军为了尽快拿到饷银往往会寻求商人帮助。他们提前在商人处获得银两,并开出票据,再由商人前往归化转运局领取。如同治四年(1865年),哈密驻军就与“古城镇广香义店商民兑支二千五百两”^[1],后由商人到归化粮厅收纳。光绪后期,山西平遥帮票号进军新疆商界,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三家分号。分号经营民间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同时也承办“协饷”业务。至民国初年,迪化三家票号共存款113741两,放款852903两^[11],大大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除上述大宗商业活动外,晋商在新疆也开展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活动。他们通常在市镇开设店铺进行经营,且经营种类颇多,如开药店、饭庄、歇店、杂货店、酒铺等。除开铺经营外,部分晋商还开垦土地,贩卖瓜果蔬菜,伐木贩木等。总之,晋商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已经深入新疆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清代晋商在新疆活动的区域及其特点

清朝统一新疆地区后,越来越多的中原商人赴新疆贸易,天山南北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中原商人虽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但由于地形的阻隔,加之官方政策的影响,他们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晋商亦是如此。

(一) 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区域

在新疆的晋商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各个城镇,主要包括哈密、迪化、巴里坤、伊犁、叶尔羌、阿克苏等地。哈密作为新疆的东部门户,离中原较近,晋商一般从归化城出发,从蒙古南下到达哈密,“燕晋商人多出焉”^[6]。巴里坤一直都有晋商活跃,至清末“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12]。迪化城也有大量晋商活动,“山陕各处商贾之贄,均聚迪化州城”^[13]。叶尔羌虽路途遥远,但它作为天山以南重要的商贸城市,也吸引了大量中原商人前来,“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4]。阿克苏亦是晋商在南疆经商的重要城市之一,山西介休人赵明珠就从阿克苏采购玉石到中原贩卖,忻州人卢英锐也“贾於阿克苏”^[15]。

此外,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区域也可以从他们入疆的商路上反映出来,晋商通过不同路线到达目的地后开始进行商贸活动。清代晋商入疆贸易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从太原过归化(今呼和浩特),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到达古城(今奇台)的路线被称之为北路;南路则是从归化出发,过乌里雅苏台到阿尔泰,再经哈密、吐鲁番到达喀什噶尔;西路则是从西安出发经兰州,由敦煌进入新疆到达于阗、叶尔羌。

(二) 晋商在新疆地区的活动特点

清代晋商广泛分布于天山南北,他们通常聚集在天山南北重要的商业市镇或屯田中心,并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

1. 分布的广泛性

晋商作为新疆历史上重要的商人群体,他们一般活跃于哈密、伊犁、迪化、叶尔羌等著名商业市镇或屯田中心。事实上,晋商所踏足的远远不止这些地方,为了获取利益,他们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山西忻州商人是晋商赴新疆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自乾隆时开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闐、叶尔羌等处”,行程万里“联肩接踵,毂击车驰”^[16]。商人在外经商通常会设立会馆,而清代晋商在新疆地区所设山西会馆就有六处,分设于迪化、巴里坤、奇台、焉耆、伊宁、塔城等地。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迪化、奇台、玛纳斯、绥定、塔城、承化等地依然建有山西会馆。清乾隆时,在交通不便的“南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和闐八城),“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商民是南八城商民队伍的主体”^[17],亦可见当年晋商贸易深入之广泛。

2.呈“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

清代的晋商在新疆的地域分布呈“北多南少”的特点,即在天山北路经商者较多,在天山南路的则相对较少。一方面,受制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因素,天山南路较之于北路来说,与中原距离更远。北有天山,境内又有大漠,交通更为不便。无论晋商是从嘉峪关抵达哈密,还是从蒙古到达古城,再到新疆地区,都必须经过天山北路。要想抵达南路进行贸易,则需跨越天山或越过沙漠,这无疑增加了经商的风险。所以大部分商人止步于天山北路贸易,前往南路经商者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造成“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更是与清政府的政策分不开。清朝在新疆的治理上呈现出“重北轻南”的特点,对于天山南路的治理重在维持社会的稳定,而非经济发展。乌什事变后,清政府认为在新疆“内地贸易商民渐多,所居与官兵相近,尚可弹压,不令生事。若与回人相杂,易滋事端”^[18],所以下令商民只能在驻兵处进行交易,不得与回人杂处,满汉官民与当地回人分城而居。虽然减少了事端发生的机率,但也阻碍了晋商在天山南路经营活动的发展。

四、清代晋商对新疆发展产生的影响

清代晋商往来于天山南北,积极投身到与新疆有关的各类商业贸易活动中,成为沟通中原和天山南北的桥梁。他们既推动了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文化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疆的安定。

(一) 推动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在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多伴随战争。天山南北的经济遭受了战争的破坏,城镇沦为片片废墟。但在清政府的苦心经营下,经济得以恢复,一座座繁荣的城市又被建立起来。随着城镇的重建恢复,晋商等中原商民在新疆的商业活动又推动了新疆城镇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带动了新疆地区的人口增长,加速了边疆城镇由政治军事性质向商业性质的转变。

从中原商人开始进入新疆以后,新疆各城镇经济发展迅速。巴里坤“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节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1]。迪化作为北疆著名的商业城市,“市廛迤迁相属,肩磨毂击,比于吴会之盛”^[12]。伊犁则从昔日荒凉的边疆之地逐渐变成一大商业城市,“商民阗阗,民乐田畴,轮蹄懋迁,货殖平准”^[19]。阿克苏处于新疆南北交通要道,“内地商民,藩外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14]。喀什噶尔“商务之繁,人烟之庶比于省城”^[20]。叶尔羌城“市廛栉比,商务至盛”,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4]。

(二) 维护了新疆社会的安定

清朝在收复天山南北过程中,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民通过为军队提供、运输粮草和进行随军贸易,为清军的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当天山南北收复后,叛乱偶有发生,边疆的安定受到威胁。进入新疆经营贸易的晋商则与当地人民风雨同舟,共同抵御外敌。他们也积极组织捐款,并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共同家园,维护了新疆社会的安定。

晋商巨贾范氏在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中多次承担运输粮草的重任,耗费颇多,“前后十年,运米凡百余万石,所节大司农金钱六百余万”^[21]。由他们所承担的运粮活动不仅让清军及时获得粮草支援,还节省了国库开支,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道光年间,张格尔在南疆发动叛乱,因清军未能及时赶到,当地的商人、民众自发组建商民团进行坚决抵抗。当叛众围困叶尔羌城时,晋商荆中璞兄弟二人担任商民团团长,“制造战攻器械,率领数百人昼夜登陴巡城,固守相持数十日”^[8],城破就义。他们用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彰显了晋商维护新疆社会安定的决心。除了直接参与抗击侵略活动中外,晋商还积极组织捐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新疆社会的和平稳定。咸丰年间,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原商民纷纷慷慨解囊,捐助军饷。据相关档案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的叶尔羌捐输活动中,捐饷者三十二人,其中晋商有十六人,占比百分之五十。咸丰四年(1854年),又有六人为叶尔羌捐饷,晋商五人,占比百分之八十三。咸丰四年,晋商共五人为阿克苏捐饷,占当次捐饷者的百分之七十二^[22]。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往往得不到保证,晋商票号便源源不断地接济西征军,数额高达八百余万两^[23]。

(三) 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清代晋商在新疆的活动既带来了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货物,又将其本身文化、习俗传至新疆;既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需求,又丰富了边疆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随着晋商在新疆商业活动的开展,中原与新疆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发展。

迪化富庶甲于西域,“故四方商贾,云集而麇至者日着众,大抵山右之客为尤多”,为“敦信义,而昭诚敬”,晋商聚集的商业重镇迪化、奇台等地均建有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会馆内奉祀关帝,也成为当地最大的关帝庙。于是,关帝信仰也随着晋商的活动得以进一步传入新疆,在新疆得到蓬勃发展。每逢节庆日、关帝生辰忌日,无论羁旅的人身在何方,在外的晋商都会按家乡的风俗习惯焚香祭拜一番,并在会馆外搭台献戏以供娱乐,借此以“敦桑梓之谊,庚雍睦之休者”^[24],还逐渐演化出了“庙会”这一形式。每逢春节和一些节日,山西会馆都会组织本帮人进行社火表演,有汾阳大套、秧歌、高跷、高台,花鼓、龙灯、狮子、大头和尚、旱船等,这些精彩的活动深受各民族群众欢迎。“社火作为一种春节期间表演的民间风俗活动,体现了中原汉族在新疆定居后的文化认同和聚合”^[25]。另外,山西的特产如陈醋、汾酒,还有如刀削面、过油肉等山西的美食也备受新疆人民青睐。正是晋商在新疆的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原与新疆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使得新疆社会生活深深打上了晋商和晋文化的烙印。

结语

有清一代,晋商频繁活动在天山南北与中原之间,加强了天山南北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晋商在新疆的活动一方面活跃了新疆的经济市场,推动了新疆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文化上的交流、交融。此外,晋商对新疆的捐款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新疆的安定。虽然晋商在向近代化转型中走向衰落,但他们在天山南北的稳定和巩固中的历史功绩不能磨灭。

参考文献:

- [1]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98,100-101.
- [2] 官修.清实录.清圣祖实录:卷 267[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620-621.
- [3] 赵尔巽.清史稿:卷 317[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34-10735.
- [4] 米镇波.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90.
- [5]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卷 2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78.
- [6] 钟广声.新疆志稿:卷 2[M].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61-63.
- [7]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0.
- [8] 艾绍谦修,姚东济纂.续修临晋县志:卷 1[M].光绪六年刻本:85,77.
-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89-90.
- [1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8.
- [11]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336.
- [12] 马大正、华立.新疆乡土志稿[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206.
- [13] 官修.清实录.清穆宗实录:卷 120[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649.
- [14]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 2[M].道光七年刻本:13-14.
- [15] 王轩、杨笃等.山西通志:卷 137[M].国家图书馆藏本:33—34.
- [16]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卷 63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04.
- [17] 华立.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103.
- [18] 官修.清实录.清高宗实录:卷 746[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213.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罕见史料汇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65.
- [20] 谢彬.新疆游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30.
- [21]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04.
- [22] 郭娟娟,王泽民,刘建生.清代塞外贸易的山西忻代商人[J].历史档案,2016,(03):80-87.
- [23]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233.
- [24] 戴良佐.西域碑铭录[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380.
- [25] 张金晶.会馆与奇台社火[J].昌吉学院学报,2014,(05):14-19.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ctivities of Shanxi Merchants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 Bibo¹

¹*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Shanxi merchants engaged in business in Xinjiang, becoming an important business group in Xinjiang's history. Their activities served as a vital bridge for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y we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Xinjia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taining border stability, and facilita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Keywords: Qing Dynasty; Xinjiang; Shanxi merchants